

## 玄奘的四川之行

黃運喜\*

### 《摘要》

四川是玄奘參學佛法、受具足戒、展露頭角的地方，也可說玄奘在四川時期的參學及受戒，開啓了日後西行求法、研究法相唯識之學的契機，奠定了一生事業的基礎。

本文主要敘述玄奘從武德初年，從長安經漢川到成都的經過，以及駐錫四川期間的依止。由於受限於資料，歷來學者對段史實，大都一筆帶過，本文雖不長，但可彌補玄奘研究之不足。

### 關鍵字

玄奘、長捷、成都、空慧寺、多寶寺、聖水寺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 Hsuan Chuang's Pilgrim Sichuan

Huang, Yunshi\*

### ABSTRACT

Sichuan is the place where Hsuan Chuang(Xuna Zang) did the research and studied Buddhist doctrine, received the full ordination, and made himself stand out conspicuously, which would later inspire him to make up his mind to pilgrim to the west and gain a reputation for studying Faxiang, or Dharmalaksana, Sect. It's also the place where Hsuan Chuang established the groundwork of his lifelong career.

This article mainly narrates the progression of Hsuan Chuang's pilgrim from Changan through Hanchuan to Chengdu in Wu De first year as well as his stay and his mentors in Sichuan. Limited by the lack of data, historians tend to downplay the historical facts. Although this article is not quite long, it still supplements the shortage of research.

### **Key words**

Hsuan Chuang, Chang Jie, Chengdu, Konghui Temple, Duobao Temple, Shengshui Temple

---

\* Huang, Yunshi,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玄奘（600？—664）的一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從出生、出家、受具足戒、及到各地遊方參學，其行跡包括家鄉河南緱氏（今偃師縣）、洛陽、長安、漢中、成都、荊州、揚州、吳會、趙州、相州等地。第二個階段為冒險西行求法，歷經約十七年（首度出關年代未定論）的時間，往返五萬里，途經一百一十國，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第三個階段為：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回國後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為止。這段期間除有多次陪從太宗到各地巡幸，及在高宗時回家鄉探訪一次外，大部分時間均用在譯經事業，在其最後十九年的歲月中，共譯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的經典，譯作量多質精，無出其右者。

玄奘五歲喪母，十歲喪父，後隨次兄長捷法師到洛陽淨土寺居住，十三歲出家時即以「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鴻鵠大志，感動主試官大理卿鄭善果，讓他破格剃度。唐初，玄奘與兄長捷法師到長安，本欲向高僧大德學習佛法，但國家初建，兵戈未寧，長安的高僧們紛至四川避難，玄奘求法心切，與長捷法師聯袂赴川，居止成都多寶寺與空慧寺，並在成都受具足戒，後因感「益部經論，研覈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sup>1</sup>即感到在成都的法義已研習殆盡，期望先到各地參學後再回京師，向更多的高僧請教，遂以私與商人結侶的方式，泛舟三峽，沿江而下至荊州天皇寺，結束了與四川的一段情緣。<sup>2</sup>

<sup>1</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頁222b。

<sup>2</sup> 玄奘採取私與商人結伴泛舟而下的原因，一為唐制僧侶需定止一地區，非經核准，不得遠行；二為其兄長無意離開四川。後來玄奘在荊州，因講經說法得到唐宗室漢陽王李瓌的護持，發給玄奘各處旅遊的許可，此後玄奘到各地參訪均暢行無阻。

## 二、求法心切：遂去父母之邑

隋末，煬帝失德，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其中以李淵、李密、王世充等三股勢力在晉、陝、豫地區最為可觀，他們分別佔據太原、洛陽及其附近、長安等地區，爲了爭奪糧倉，群雄軍隊與隋軍發生多次的拉鋸戰，影響所及，洛陽、長安兩大城市僧侶無法安住，紛紛企圖前往異地，以求避難兼弘法或參學。大業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淵擊敗隋軍，入長安，尊代王楊侑爲皇帝，改元義寧，自爲丞相，進封唐王。次年（618）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李淵稱帝於長安，改元武德，開始了爲期二百九十年的大唐王朝，此年李世民也底定巴蜀之地。與李淵稱帝的同月，東都洛陽留守官員奉煬帝孫越王侗即位爲皇帝，改元皇泰，朝政由王世充掌理。

武德元年（即代王義烏二年，618）春，玄奘鑑於隋煬帝末年在東都（洛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止講學，後因國亂供料停絕，這些名僧紛紛前往蜀地，如「（慧）景、（敬）脫、（道）基、（寶）暹」等法師，遂與其兄長捷法師說：「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驅晉陽之眾，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sup>3</sup>得到其兄長捷法師同意，約於初夏抵達長安，寓居莊嚴寺。<sup>4</sup>玄奘與長捷法師從洛陽出發之時，長安、洛陽在表面上仍是隋朝的領土，兩地交通順暢。未料，他們到達京師長安時，因李淵稱帝，國基草創，政治上仍處於兵荒馬亂中，「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sup>5</sup>關中、長安的名僧爲避兵災，相率去蜀，徒留下寺院在京師，成都已成當時的佛教重鎮，玄奘旋即啓兄入蜀。

---

<sup>3</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a。

<sup>4</sup> 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 50 冊，頁 446c。

<sup>5</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a。

依現有資料推論，玄奘與其兄長捷法師選擇到長安，雖有「且戰且走」的意味存在，但不失為明智的抉擇，因為洛陽「景、脫、基、暹」等法師前往蜀地的消息，已為洛陽當地僧徒所廣知，由於玄奘對佛法「求知若渴」，不放棄任何學習機會，在洛陽淨土寺出家後的數年期間，早已親近「景、脫、基、暹」等法師，所以不急於追隨這些法師的步伐，而選擇直接入蜀。從玄奘與長捷法師所說的「余聞唐帝驅晉陽之眾，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這句話中，不難看出他期望全國各地的高僧大德都會集長安，讓他兄弟倆可以從容問學，只不過這個期望，要到數年後天下平定才能達到，這也是《續高僧傳》記載玄奘見當時長安佛教情形而「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逾劍閣」<sup>6</sup>的原因了。不過長安為從洛陽前往四川的必經之地，從長安向南通過秦嶺山脈，經漢中盆地，再越大巴山脈，就可到達四川，玄奘先到長安觀察情況，再進入四川，並未浪費時間。

### 三、蜀道難：行行復行行

長安與成都在地理位置上，分別位於關中盆地與四川盆地，兩地之間，有秦嶺、大巴山脈阻隔，中間還夾雜一個漢中盆地，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而言，兩地交通還不是很方便。不過人為萬物之靈，可憑自己的意思選擇定居一地或外出活動，高山險阻，對艱毅卓絕的玄奘兄弟等人而言，並不構成威脅，他們花了數月的時間，約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終於抵達「天府之國」的成都。<sup>7</sup>

關於玄奘四川之行所經過的路線，較無疑義的是關中盆地到漢中盆地這段，無論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下簡稱《三藏法師傳》）或《玄奘法師行狀》均記載：「經子午谷入漢川」。至於從漢中盆地到四川盆地這段路線，相關資料均

<sup>6</sup> 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卷四，446c。

<sup>7</sup> 楊廷福，《玄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68。

未記載，只能用推測。

唐代從關中盆地到漢中盆地的主要路線有四條：藍田武關道、子午道、駱谷道（儻駱道）、褒斜道。由於相關資料均記載玄奘兄弟「經子午谷入漢川」，故根據嚴耕望〈子午谷道〉所載略加說明：梁唐子午道，由長安南行四十里子午鎮，十里入子午谷口，<sup>8</sup>五十里子午關（又名石羊關），三十里秦嶺，二十里夾嶺，二十五里沙溝，二十里高關，二十里苦竹溝，三十里東江口，又四十里徐家梁，三十里雞公梁，三十里洵陽壩，四十里文公廟，四十里火地，二十里七佛溝，四十里寧陝老城，十五里寧陝新城，共凡五百里。沿途重山峻嶺，至為難行。<sup>9</sup>寧陝以西，略循長安河（子午河東源）、子午河北岸下行，經湯平河（居民點）、青草關，至兩河口（E108°10'、N33°13'），去寧陝一百八十里。又西經金水河街、酉水街至洋縣，去寧陝共凡二百九十里。山僻小路，夏秋水漲，梗阻難行。<sup>10</sup>唐人志書云，自長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蓋即就子午道而言，實為長安、洋州之最捷徑道。<sup>11</sup>（見附圖一：梁唐子午道路線圖）

---

<sup>8</sup> 嚴耕望引李之勤〈歷史上的子午道〉云：「子午谷只是一條長僅數十里的小河谷，子午道由西安市南行沿子午谷入山後不久，即轉入澧水河谷，溯谷而上，翻越秦嶺。」（李文原載《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2期。）

<sup>9</sup> 嚴耕望，〈子午谷道〉，收入《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卷〈秦嶺仇池區〉，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85年，頁674。

<sup>10</sup> 嚴耕望，〈子午谷道〉，收入《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卷〈秦嶺仇池區〉，頁675。

<sup>11</sup> 嚴耕望，〈子午谷道〉，收入《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卷〈秦嶺仇池區〉，頁680。



唐初子午道曾設驛站，沿途偶有佛寺，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載有終南山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等，對於往來僧侶，提供許多的方便。由於玄奘通過子午道前往四川，是在從容的環境下啓程，每日行程只需依據各驛站、村庄、城鎮、之距離與道路狀況設定，每日約走二十至四十里左右，從長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的旅程，估計約在二十餘天即可走完，至洋縣時再溯沿漢水，只要數天即可到達漢中（南鄭縣），也就是從長安出發，約一個月的時間就可達漢中，即《三藏法師傳》所稱的「漢川」。

玄奘兄弟在漢川，意外的與空、（慧）景二法師重逢，他們都是東都道場之大德，其中（慧）景法師更是玄奘在洛陽淨土寺出家時，教授其涅槃經的師父，<sup>12</sup>師徒異地相見，悲喜交集，玄奘遂在此地停留月餘，一方面從之受學，另一方面則補充體力，準備另一段艱苦的入川旅程。關於玄奘在漢中所駐錫的寺院，並未見相關史書記載，唯明復法師（1914—2005）在抗戰期間，曾以軍人身份到漢中聖水寺遺址，目睹這這座寺院遭受太平天國破壞後殘存的斷垣殘壁，聆聽當年身受其害的小沙彌口述，得知聖水寺創建於隋代，是玄奘當年駐錫過的寺院，玄奘曾

<sup>12</sup> 冥祥，《大唐故三藏法師玄奘行狀》，《大正藏》第50冊，頁214a。

在寺前栽種一棵樹，還為寺院留下卓錫泉、拜誓臺等遺跡。惜至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國黨羽陳得才等，由湖北竄至陝西，路過漢中，以聖水寺為王府，將寺內佛像搗毀，佛像法器通通丟到漢江裡，寺裡原有百餘口人，長毛來時，跑了一半，被殺了一半，僅留下六個小沙彌，都是十三四歲，專門侍候陳爺，其中一位即向明復法師口述的僧侶，太平軍在臨走前，一把火將聖水寺燒燬，後人在其遺址旁另建一座聖水寺，但規模、格局均無法與原寺院相比。<sup>13</sup>

此後空、（慧）景二法師遂與玄奘兄弟結伴，溯漢江至其源頭的金牛縣，再向成都出發，玄奘「雖在行旅，恒執經隨問」<sup>14</sup>，充分把握學習機會。關於玄奘從漢中盆地到四川盆地的路線，綜觀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各文，發現以走「金牛道」（南棧）的可能性最大，此因金牛道是隋唐時期最大眾化的道路，無論是文人商旅、皇帝避難幸蜀，或重要軍事行動，大都選擇這條道路，其他如隴上道、米倉道、陰平道、天寶荔枝道（涪州到洋州）等無論距離、路途狀況等條件均不及金牛道，玄奘似乎不會捨棄金牛道而改採其他路線。

依嚴耕望〈金牛成都驛道〉記載，金牛道所經過的路線為，由金牛西南經三泉、利州、劍州、綿州、漢州、成都。<sup>15</sup>自三泉以南，益昌（今昭化）以北，依嘉陵江東岸築路，穿越大巴山山脈，其中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東岸行約六十里，至九井灘，最為險惡，為舟楫之阻，途經遐萌關；三泉至利州（廣元）有橋閣一萬五千三百餘間，<sup>16</sup>利州以南，尚有劍閣等險要之地，不利行旅往來。玄奘一行

<sup>13</sup> 釋明復，〈「滅法天王」百年祭〉，《明復法師佛學論叢》，第一冊，新竹市，佛教覺風文教基金會 2006 年，頁 160—162；毛鳳枝，《陝西南山谷口考》，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96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頁 32。

<sup>14</sup> 冥祥，《大唐故三藏法師玄奘行狀》，頁 214b。

<sup>15</sup> 嚴耕望，〈金牛成都驛道〉，收入《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85 年，頁 863。

<sup>16</sup> 嚴耕望，〈金牛成都驛道〉，收入《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頁 872。



人經過金牛道到四川，估計大約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約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終於抵達成都。（見附圖二：金牛道路線圖）



#### 四、鴻鵠展翅：從學法到受戒

四川為形勢完整盆地，地方富裕，自古以來「天府之國」的美譽，不脛而走。在佛法的傳播上，四川位於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交匯之地，從東漢開始就有高僧在此弘法，留下不少寺院、佛像、摩崖造像等。隋末唐初，中原戰亂，蜀中相對的安定，中原許多高僧大德為避難，紛紛選擇駐錫四川，而成都又是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然吸引許多高僧大德薈萃於此。

玄奘等人初到成都的駐錫寺院，據《三藏法師傳》載其兄長捷法師「住成都

空慧寺」，<sup>17</sup>慧景及玄奘的住處，依〈大唐故翻經大德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并序〉謂「既爾黃霧興妖，丹風起孽，中原盪覆，具禍以燼。(道因)法師成杯西邁，避地三蜀，居於成都多寶之寺。…法師以精博之敏，為道俗所遵。每設講筵，畢先招迓，常講《維摩》、《攝論》，聽者千人。」以及「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摩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道因)法師論文，肅然改容。」<sup>18</sup>等句推測，成都多寶寺在唐初，已成為長安、洛陽高僧大德匯集，法筵最盛的佛教寺院，除道因、寶暹駐錫外，道基、慧景、道振法師亦疑在此寺講說經論，《續高僧傳》卷十四稱道基「有隋墜曆，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稱慧景、寶暹「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采。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sup>19</sup>由於玄奘在洛陽及漢中時，有兩度親近慧景法師的經歷，師徒名分已定，且又一道到成都，所以師徒初到成都駐錫多寶寺的可能性很大。另從唐代講經儀式推測：(講經當天)辰時開始，(講經前)打鐘驚眾、(聽者入座後)講師、都講上堂登高座、口贊梵唄於講經前後、開題(講解題意)、舉問、問難、迴向下座禮辭、復講等八部分，為在魏晉南北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來的。宋僧元照在《四分律行事抄資記》在加上初禮三寶、打磬靜眾成為十法。<sup>20</sup>為避免每日太早奔波，學僧長住在講經寺院為相當合理之事。

多寶寺在成都東城外十里，相傳魏晉時期自印度而來的千歲寶掌和尚曾居住

<sup>17</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a。

<sup>18</sup> 李儼，〈大唐故翻經大德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并序〉，《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成都市，巴蜀書社，2004 年，頁 12。

<sup>19</sup>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四，〈道基傳〉，頁 523c。

<sup>20</sup> 黃運喜，《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兼論與其當代社會文化互動關係》(修正二版)，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7 年，頁 253。

於此，<sup>21</sup>《三藏法師傳》記載玄奘在成都前幾年的事跡謂：

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毘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眾，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sup>22</sup>

玄奘初至洛陽淨土寺當童行，先從兄長捷法師研習《維摩經》、《法華經》，剃度後又從慧景法聽受《涅槃經》，嚴法師聽授《攝大乘論》，及至漢中，又逢空、(慧)景兩法師，向他們執經請益。到成都後，更從道因法師聽受《維摩經》、《攝大乘論》，從道基法師聽受《攝大乘論》，從寶暹法師聽授《阿毗曇》，從道震(振)法師聽受《迦延》(《發智論》的舊譯)。玄奘千里迢迢的入川求法，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學習機會，把握住每一寸光陰，努力不懈加上天資聰穎，很快的就在四川展露頭角，四方景從之餘，視他為東漢時代的清流李膺、郭泰。

武德三年(620)玄奘年滿二十歲，<sup>23</sup>依佛制在成都受具足戒，《三藏法師傳》稱玄奘在受戒後，「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算是相當難得的。一般僧尼在正式家之後，到受戒之前，有一段時間可學習經論，充實佛學基礎，但到受具足戒之後，則有「佛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乃聽教參禪」的制度。<sup>24</sup>五年學戒的用意，除戒律的專研、修持，與僧格的養成外，同時也是戒、定、慧三學的基礎，因唯有以律攝僧，僧團才能維持清淨的團體生活。僧格端正

<sup>21</sup> 王衛明，《大聖慈寺畫史叢考—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頁34。

<sup>22</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222a。

<sup>23</sup>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武德五年(622)，本文從楊廷福，《玄奘年譜》所載。

<sup>24</sup> 釋廣化，《沙彌律儀要略集註》，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78年，頁9。

之後，則視個人興趣，選擇參禪、研究宗派義理、修密或修淨土法門。唯這種學習方法，透過僧傳中記載得知，歷代僧侶在學律的時間及方法上，已有相當大的變通，不拘泥於條文規定，故以玄奘的聰穎，對於戒律的「五篇七聚」僅在出家後首次結夏安居期間學習一遍就精通，<sup>25</sup>所以有更多的時間遊心法海。

玄奘似在受戒前不久，移居空慧寺，與兄長捷法師同住一寺，一方面代表結束有系統且全面從師受學，另一方面也可調適身心，準備受戒。空慧寺在初唐為成都重要寺院之一，原稱「龍淵寺」，相傳始建於東漢時期，隋末因避李淵名諱，更名「空慧寺」，在成都西南石牛門市橋處，俗稱「石牛寺」、「石犀寺」。武宗會昌五年（845）毀於法難，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回於原寺舊址重建，摩「聖壽寺」額豎此，後僖宗幸蜀，頒賜御書。<sup>26</sup>玄奘昆仲在空慧寺各擅所長，《三藏法師傳》稱長捷法師為：

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鄴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玄奘則是：

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振頹綱，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

<sup>25</sup> 「五篇七聚」為依據罪果而把具足戒分為五篇，即波羅夷、僧殘、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再視其罪性和因罪而為七聚，即五篇加上偷蘭遮，即成六聚。另從突吉羅中開出惡說，而成七聚。（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五）》頁2560b。）

<sup>26</sup> 參見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嚴耕望史學論文集》，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頁247—248。

逮。<sup>27</sup>

長捷法師風度高雅，身材魁偉，個性爽朗，有其父之風，精通佛學與老、莊，善講說，較具名士之風格，益州路總管鄴國公竇軌、益州行台民部尚書韋雲起，均對其欽重。玄奘則意至堅定，志向遠大，抱持各地遠行求法巡禮之心，面對萬難而終不退縮的氣度，則為長捷法師所不及。兄弟倆的聲譽若與廬山慧遠、慧持相比，也絲毫不遜色。

玄奘在空慧寺，禮觀音菩薩聖像甚為虔誠，據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侯溥撰〈聖壽寺重裝靈感觀音記〉謂：

院有觀音瘞（塑）像，則唐奘三藏蚤歲行道乞靈之地，久歷年所，像以坩  
 激肯，此春始議完飾，向佛之人相與施助，今茲觀音大士與奘公侍立之像，  
 熠然以新。<sup>28</sup>

玄奘在禮觀音菩薩聖像之外，也受持「般若心經」，《三藏法師傳》敘述其在西行求法經莫賀延磧（沙河）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唯一心唸誦「般若心經」，此心經的來源為「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sup>29</sup>從上述兩則引文來看，玄奘對於佛法的修持是「知行合一」，故在許多危險場合時，能感應道交，脫離各種災殃。

<sup>27</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a、222b。

<sup>28</sup> 侯溥，〈聖壽寺重裝靈感觀音記〉，《巴蜀佛教碑文集成》，頁 120。

<sup>29</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4b。

## 五、歸去來兮：尋師訪道再走他鄉

《三藏法師傳》稱受戒後的玄奘，年齡、學問都日益增長，以致「益部經論，研綜既窮」，在蜀地講學的幾位大師，已不能滿足其求知欲望，當他知道盤踞在江陵稱帝的蕭銑，<sup>30</sup>已在武德四年（621）時，被夔州總管趙郡王李孝恭、行軍總管李靖平定，整條長江水運已暢通無阻，遂思走長江水路，沿途探訪請益高僧後，再返回長安，繼續研究佛教義理，無奈礙於法律上的規定，以及長捷法師的反對，玄奘只能暫時蟄居成都，以待機會來臨。

影響玄奘求法最大的難題，是當時法律上的規定，按唐初制律，參酌前代關禁政策，凡行人往來，關令必據過所以勘之。所謂過所，係古代度關津時所用文書，舊謂之「傳」。《周禮·地官司貨》謂：「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玄注曰：「傳，如今移過所文書。」<sup>31</sup>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另據《太平御覽》卷五九八引晉令謂：「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過所，寫一通付關吏。」則過所之制，淵源甚為久遠。

《大唐六典》卷六謂：「凡度關者，先經本部、本司請過所。在京者則省給之；在外州給之。雖非所部，有來文者，所在給之。」同書卷三十謂：「關令掌禁未遊，伺姦慝。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sup>32</sup>人民未持過所而度者謂之私度，有關私度的規定，《唐律疏議》謂：

諸私度關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注云：不由門為越。）已至越所而未度者，減五等。（注云：謂已到官司應禁約之處。餘條未度準此。）

<sup>30</sup> 蕭銑的版圖：東到三峽，西到九江，南到交州，北到漢水。

<sup>31</sup> 鄭玄注，《周禮》，卷十五〈地官司貨〉條，武英殿聚珍本，頁10。

<sup>32</sup> 李林甫，《大唐六典》，卷六，頁42；卷三十，頁42。（台北市，文海出版社，1974年）

（疏議）曰：水陸等關，兩處各有門禁，行人來往皆有公文，謂驛使驗符，傳送據遞牒，軍防、丁夫有總曆，自餘各請過所而度。若無公文，私從關門過，合徒一年。<sup>33</sup>

本條款係針對所有人民而設，若僧侶遊參行腳未持過所，將受盤問禁止。與過所性質相類者為公驗。其實例有武宗會昌四年（844）三月，下敕勘責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台、鳳翔府法門寺等處僧人，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

過所，只用於關津，而公驗則可用於普通州縣鎮舖。二者均為政府所頒，對僧侶頗具限制性。

唐代的關禁政策，在國家邊境或與國內割據勢力接壤之處，執行較為嚴格，此因牽涉到國防安全，至於本國人民在一般地區的行止，執行較為寬鬆，依《唐律疏議》得知，私度的處罰，最重也不過是「徒一年」，且還可以依行為人的身份、動機、有無人可具保等，給與減刑或易科罰金，甚至豁免等待遇。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玄奘欲走出四川，雖無過所或公驗，若有人願意結伴掩護，是值得嘗試的一項挑戰。

武德六年（623），玄奘透過一些往返長江水路的商人幫助，私自搭上船隻，沿江而下，到荊州（江陵）天皇寺。因玄奘在四川時，聲名遠播，荊州僧俗久聞其名，故至荊州即被要求講解經論，故「為講《攝論》、《毘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sup>34</sup>《攝大乘論》、《阿毘曇》均是玄奘拿手的論典，每次開講，均得到僧俗讚嘆，深得漢陽王李瓌的贊助，《三藏法師傳》稱當時的情形：

<sup>33</sup> 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卷三，台北市，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頁66。

<sup>34</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222b。

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峰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嘆無極，嘖施如山一無所取。<sup>35</sup>

當然玄奘在荆州的開講，僅是順著因緣，與大眾結下法緣，其內心仍惦記著漫漫的求法之路，所以在得到漢陽王李瓌幫助下，順利的拿到了旅行通行證：過所及公驗，並在武德七年（624）時，沿著長江東下，經歷揚州、吳會，再到相州、趙州，向當時的佛教名宿請益，終於在武德八年（625）秋，從趙州西赴長安，展開人生的另一階段生活。

從玄奘離開四川、荊州後，曾到相州（河南安陽）向慧休法師學《雜心》、《攝論》八個月，又至趙州（河北趙縣）向道深法師學《成實論》十個月，然後才返長安向道岳法師學《俱舍論》的史實推測，玄奘經過多年的參學研究佛法，已能統攝佛法要旨，並從中產生了疑情，爲了詢求答案，所以他不辭辛苦，到處行腳參訪，最後因在國內「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sup>36</sup>於是走向西行求法一途。

## 六、結論

玄奘與四川之緣，肇端於東都洛陽，此因隋末煬帝失德，群雄並起，原所建立的四個道場，因國亂供料停絕，名僧紛紛前往各避難。年輕的玄奘，有感於時局動亂，遂建議其兄長捷法師，相邀「共去父母之邑」而前往長安，未料此時的

---

<sup>35</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b。

<sup>36</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 222c。



長安，因唐朝初建，仍處於兵荒馬亂中，關中、長安的名僧為避兵災，相率去蜀，徒留下寺院在京師，成都已成當時的佛教重鎮，玄奘旋即啓兄入蜀。

相關資料均記載玄奘兄弟「經子午谷入漢川」，唐人志書云，自長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蓋即就子午道而言，實為長安、洋州之最捷徑道。玄奘兄弟大約走了一個月到達漢中，在此地，意外的與來自洛陽的空、(慧)景二法師重逢，玄奘遂在此地停留月餘，然後一道出發，前往成都。關於玄奘從漢中盆地到四川盆地的路線，綜觀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中〈山劍滇黔區〉各文，發現以走「金牛道」(南棧)的可能性最大，一行人估計大約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約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終於抵達成都。

初到成都，玄奘進駐多寶寺，從道因法師聽受《維摩經》、《攝大乘論》，從道基法師聽受《攝大乘論》，從寶暹法師聽授《阿毗曇》，從道震(振)法師聽受《迦延》等，把握住每一寸光陰，努力不懈加上天資聰穎，很快的就在四川展露頭角。玄奘似乎在受戒前不久，移居空慧寺，與兄長捷法師同住一寺，受戒後首次坐夏，「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故有更多的時間遊心法海。戒後的玄奘，年齡、學問都日益增長，以致「益部經論，研綜既窮」，並對佛法中的一些議題有了疑情，在蜀地講學的幾位大師，已不能滿足其求知欲望。當他知道盤踞在江陵稱帝的蕭銑已被平定，長江水運暢通無阻，遂思利用長江水路，沿途探訪請益高僧後，再返回長安，繼續研究佛教義理，無奈礙於法律上的規定，以及長捷法師的反對，玄奘只能暫時蟄居成都，以待機會來臨。

武德六年(623)，玄奘透過一些往返長江水路的商人幫助，私自搭上船隻，沿江而下，到荊州(江陵)天皇寺，並在此寺講說《攝大乘論》、《阿毘曇》各三遍，終於得到漢陽王李瓌幫助下，順利的拿到了旅行通行證：過所及公驗，得以自由的在國境內各處旅遊，巡師訪道，其後玄奘沿著長江東下，經歷揚州、吳會，

再到相州、趙州，向當時的佛教名宿請益，終於在武德八年（625）秋，從趙州西赴長安，展開人生的另一階段生活。